

三元宫

红色沃土 新篇

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战略决策地

陈泓洁

位于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西城街道西山社区下西山居民小组的三元宫会议遗址，是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曲靖期间，召开重要军事会议、确定关键战略转移方向的核心红色遗址，承载着厚重的长征历史记忆与革命精神。

1935年4月27日下午，中央红军抵达现麒麟区、马龙区交界的上下西山、西屯村一带驻扎宿营。当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红军总部首长宿营于下西山三元宫，并在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联席会议。刘伯承、张闻天、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参会，会议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会上，党中央、中革军委全面研判当时红军面临的复杂战局形势，果断调整战略部署，放弃原定在滇东决战、回师贵州开辟局面的计划，正式确立向西挺进、快速抢渡金沙江、奔赴川西建立新苏区的核心战略方针，为中央红军摆脱敌军围追堵截、顺利实现战略转

移指明了方向。

此次决策的落地，依托当日先遣部队在关下村成功缴获的云南军用地图。参会人员结合精准地形情报，细致研讨、敲定完整的抢渡金沙江行动方案。会后，朱德总司令在三元宫签发《关于各军团28日的行动部署》等重要电文，为红军后续快速行军、突破封锁、顺利渡江提供了坚实的军事指令支撑，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次承前启后、至关重要的战略会议。

据史料记载，西山三元宫始建于清代道光年间。为铭记红色历史、传承长征精神，1996年10月，原西山乡党委、政府在三元宫前修建革命纪念碑，碑心竖刻“红军军委总部首长宿营三元宫遗址”字样，背面镌刻碑文，详细记录了红军长征途经曲靖、召开三元宫会议的历史。

为进一步保护红色遗址、活化红色资源，2004年3月，曲靖市委、市政府决定依托三元

宫旧址，规划建设“红军长征过曲靖”纪念园。如今，纪念园占地14.6亩，建筑面积825.58平方米，由西山三元宫会议会址、长征文化广场两部分组成。

园区广场中央矗立着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雕像，庄严肃穆、催人奋进。两层结构的会议会址内，有序布设红军长征过曲靖的路线沙盘、西山三元宫会议场景复原像、领导人宿居室复原场景，以及多个红色文物展厅。通过实物、场景、图文、沙盘等多元形式，全方位沉浸式地再现了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曲靖、三元宫紧急决策的革命历程。

历经岁月沉淀与精心修缮，三元宫会议遗址已经成为曲靖重要的红色文化地标、爱国主义教育及党史学习教育阵地。这片镌刻着红色记忆的土地，持续传承着不怕艰难、勇于突围、忠诚担当的长征精神，成为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初心使命的重要精神载体。

【红色遗物】

羊毛披毡：遮风御寒映初心



羊毛披毡。黄凯供图

在宣威市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纪念馆内，一件饱经岁月磨砺的羊毛披毡被静静陈列在展柜之中。毡体虽破损严重、原貌尺寸已无从考证，却真实镌刻着红二、六军团长征过宣威的艰苦征程，见证着军民相依、患难与共的深厚情谊。

这件羊毛披毡为纯羊毛质地，是西南地区群众常用的传统御寒防雨服饰，形制近似斗篷，宽大厚实、穿脱便捷，能有效抵御山间风雨和严寒，十分适用于云贵高原复杂多变的山地气候，也是红军长征途经滇东地区时，适应地域环境、克服恶劣天气的重要御寒物资。

据史料记载，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长征途经宣威龙潭一带。行军途中，红军战士不畏艰险、风雨兼程，在

物资极度紧缺、行军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始终坚守为民初心、体恤当地百姓。这件珍贵的羊毛披毡，正是当年红军队伍赠予当地村民王邦连的暖心毡。

长征岁月，山高路远、风雨凛冽，一件御寒披毡是行军路上的稀缺物资和保命装备。红军将贴身实用的御寒物赠予群众，用最质朴的举动、最真挚的温情，践行着人民军队爱民为民的初心使命，在滇东大地上播撒下红色的火种。

王邦连小心翼翼珍藏着这件承载着军民深情的披毡。后来，他将其无偿捐赠至原宣威县文化馆，这件披毡最终入藏宣威市虎头山红军烈士陵园纪念馆，成为记录红军长征过宣威、见证军民鱼水情的珍贵实物史料。

祭祀坑外，追问未解之谜

40载考古深耕不辍，39次考古发掘，仍只是翻开这部地下之书的一部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乔钢介绍，三星堆遗址发掘仍在进行。目前，考古队正持续在仓包包小城、月亮湾东侧、真武宫等地点，推进水路交通节点、城址功能布局等研究。未来还将持续开展城址功能布局研究和水资源利用研究。

作为学术研究的“富矿”，三星堆仍有大量未解之谜静待破解。

三星堆青铜器铸造地问题受到广泛关注，四川大学教授霍巍在做学术总结时说：“现在从青铜器器物入手，无论我们从它的形态、风格、纹饰，还是从它的制作手段、原材料等等去推测，总觉得‘隔靴搔痒’，缺乏最后的关键证据，那就是铸造地点的发现。”

北京大学教授孙华关注“三星堆的水系与城池复原”，希望通过共同努力进一步明晰三星堆古城的功能分区。“遗址地处沱江冲积扇上，唯有厘清沱江水系的古今演变，方能准确认识三星堆先民何以选址于此、为何如此规划布局，进而揭示城址与水环境、水资源及地理环境之间的深层关联。”孙华说。

除此之外，三星堆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精神信仰，乃至未来是否会发现高等级墓葬等问题，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新华社成都8月5日电）

三星堆5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面具。（四川省文物局供图）



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40周年

惊世之后，追问不止

新华社记者童芳 余里

1986年夏天，三星堆1号、2号祭祀坑相继被发现，沉睡数千年的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2026年7月底，多位国内外考古学家齐聚四川德阳广汉，参加“纪念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现四十周年暨古象牙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从简陋草棚到恒温方舱，从惊世器物到文明图景，40年考古接力，让三星堆由一处遗址走向世界，也向着诸多未解之谜，再次出发。

器物无言，照见多元一体

“40年来，祭祀坑的发现，让我们对中国历史整体有了新的认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宋新潮说。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认知受限于史料，更多聚焦于黄河流域。三星堆的发现，则以实物打开了另一扇窗：8个祭祀坑总计面积不到100平方米，却出土了近2万件青铜器、金器、玉器、象牙等文物，证明在3000多年前的长江上游，存在与中原王朝同时期且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陈坤龙在研讨会上介绍，通过科技考古的方法发现，三星堆的青铜尊、青铜罍等容器的泥芯矿物来源指向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三星堆青铜神树、青铜面具等本地风格器物的泥芯矿物则源于本地。器物与技术往来交织，三星堆成为观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样本。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巨大的青铜纵目面具、近4米高的青铜神树、黄金权杖等器物，其造型之奇幻、文化内涵之独特，在中国其他地区前所未见。这表明古蜀文明在吸收中原文化的同时，也发展出了极具自身特色的神权与王权体系，展现了中华文明内部惊人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我认为三星堆最重要的发现意义就是，即使在中原王朝兴盛的时期，各区域都有自己非常有特色的区域文明，既接受中原的影响，同时又有很多自身的发展和创造，这样才构成了我

们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说。

草棚方舱，见证考古变迁

作为当年1号、2号祭祀坑发掘领队之一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陈显丹，至今感慨：“当年发掘条件虽异常简陋，但我们倾尽了所有心力。”

三星堆博物馆展陈的老照片中，考古工地只有简陋的草棚子，考古队员们身着背心短裤，正合力将青铜大立人像从坑底缓缓抬升；一位工作人员立于竹制脚手架之上俯身拍摄，那便是当年最为“先进”的航拍视角。

30多年后，3号至8号祭祀坑的发掘，则集中了国内多个重要研究机构力量，形成多学科合作开放平台。

钢架大棚下，考古队员在恒温恒湿的透明方舱内作业，多功能平台平稳吊升文物。数字技术把现场送到公众眼前，“透明厨房”式陈列又让修复过程走进展厅，将文物保护修复的实景实时呈现于观众眼前。

多学科考古更是在祭祀坑内发现了肉眼难见的丝绸痕迹、植物种子、动物蛋白等。三星堆稻作农业为主体的生业形态基本确认；碳14测年锁定祭祀坑埋藏年代为距今3200年至3000年；三维扫描和3D模型实现文物跨坑拼对，成功复原大型青铜器完整形态；攻克出土象牙保护世界性难题，国宝终可直面公众；青铜器铸造工艺和玉石器制造方法更加清晰……

“三星堆3号坑、4号坑、5号坑、6号坑、7号坑、8号坑的发掘，实际上建立了中国考古田野发掘、多学科结合的一个范式，这个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宋新潮说。



珠江源头（二）

历史上探寻珠江源头与最终定源

范利军

经考证，曲靖市沾益区炎方乡马雄山东麓的出水洞水源点为珠江正源。珠江源头的确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战国至西汉时期，我国最早的一部地理学著作《山海经》在记述珠江水系时说：“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清代毕沅在其所著的《山海经新校正》一书中认为，郁水有二源，一为源出云南宝宁县（今云南文山广南县）的西洋江（今右江上游），二为源出广西归顺州（今广西靖西市）的丽水（今左江上游），二水汇合于南宁的合江镇，是为郁江。毕沅还引用《汉书·地理志》中“郁水首受夜郎、豚水，东至四会入海”的记载，并把它和广义的西江联系起来，得出结论：珠江的水源来自西洋江，西洋江的上游为豚水（今北盘江）。

《水经》一书在记述珠江水系时说：“温水出牂牁夜郎县……又东至郁林广郁县，为郁水”，认为温水（今南盘江）才是珠江的水源。

北魏郦道元在《水经注》一书中正确地指出温水为珠江水源，但又错误地将南盘江与红河联系起来，从而使许多人错误地认为珠江水源自红河。

进入元代，人们逐渐对西南地区山川形势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因而温水为珠江水源一说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对珠江源头的争议，已从最初的水系问题，转至水源点这一具体问题上的。

到明代初期，学界较为普遍地认为珠江源的水源点在今富源县附近的火烧铺、明月所。到明晚期，著名的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曾根据这一线索，专程到火烧铺一带进行实地考察。他发现，源起于火烧铺和明月所的河流，仅仅是南、北盘江的支流，而不是珠江的发源地。他再次对珠江的水源点进行考察，最后指出，珠江的水源点在沾益州炎方驿附近。他随后写出《盘江考》：“南北两盘江，余于粤西已睹其下流，其发源俱在云南东境”，探明珠江源就在今天沾益区西北的马雄山。

清代关于珠江的水源点确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在今沾益区花山镇境内。但多数人都认为水源点是如今已被花山水库的尾水所淹没的牛鼻子洞。而清乾隆年间的《沾益州志》、光绪年间的《沾益州志》及李诚的《云南水道考》等则认为水源点乃是地处牛鼻子洞上方东侧的花山洞。

中华民国时期，为治理南盘江，云南水利部门曾多次对全江进行考察。1927年由秦光第主持制定的《查勘南盘江上游水利工程初次计划书》称：“江源发于沾益城西九十里之花山洞，东南流经曲靖、陆良、宜良、路南、婆兮、阿迷，复转入竹园、泸西、绕邱北、广南、富县，由剥隘入广西境，其名不一；以其曲折环绕、多向南流，故统名曰南盘江，此全江流域也”，仍然坚持花山洞为水源点一说。1942年形成的《云南南盘江水利监督署工务处正江实勘报告书》则认为“水出小孤山（今老高山）刘麦地，经松韶关，向南潜行入花山洞，伏流约半公里乃出，其出口洞高约六公尺、宽约四公尺，面乳密垂，怪石嶙峋。”“此乃南盘江最大最远之源头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珠江源的水源点问题，前后也有不同的说法，1952年形成的《南盘江查勘报告书》指出：发源地在沾益马雄山的山麓，水由一个高约6米分成两级的石灰岩岩洞流出，这是珠江流域的发源点。源头出水洞的海拔高度为2145米。但70年代以来，关于珠江源的水源点，则普遍认为是马雄山南麓，海拔2440米处。

1979年，珠江水利委员会成立，为确定珠江正源形成统一结论，珠委会决定对珠江源进行实地考察。从1980年至1984年，珠委会同曲靖地区水利电力局、沾益县水电局等部门先后6年5次对马雄山进行勘察，重点是马雄山东麓的出水洞。1984年8月初，在珠委会主持下，考察队伍邀请了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地理研究所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及部分水利科学工作者，共同研究马雄山地形、地质、勘察录像、图片资料等。本着“唯远是源”和“流水不断”两条原则，分别从水利、地理、地质等角度反复论证。在充分考虑到珠江源一带是岩溶区，刘麦地伏流出水口以上又有季节性河川大冲沟和高山沟的情况下，确认1942年和1952年的两份勘查报告提出的刘麦地伏流出水洞口为珠江正源。

1985年8月17日，珠江水利委员会和云南、贵州、广西、广东四省（区）水利厅及曲靖地区有关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及群众，在刘麦地伏流出水口即马雄山东麓出水洞处，举行了隆重的立碑仪式，向世人宣告：珠江发源于马雄山东麓，水源点在其伏流出水口水洞处。碑铭：“珠江南国，得天独厚，沃水千里，源出马雄”。